

中东民族主义的自我转型：表现、原因及影响^{*}

田文林^{**}

内容提要 政治独立后，中东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自我转型过程：政治诉求方面，从争取民族独立转向国家建构；经济诉求方面，从缺失经济功能转向经济功能的增生和强化；文化诉求方面，从多元并存的认同转向对主权国家的认同。导致中东民族主义自我转型的因素，既有总体形势的变化，也有具体形势的变化。然而，受既有历史惯性的影响，中东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与具体手段的相互背离，使新兴国家陷入极大困境。

关键词 中东 阿拉伯国家 民族主义

“二战”后，中东国家获得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后，建立主权国家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中东民族主义政权才有了国家治理的新使命。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开始自我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主要表现是什么？背后的动因有哪些？最终效果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 后革命时代的民族主义转型

毫无疑问，民族解放运动使阿拉伯人民最终摆脱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外来压迫，建立起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正如格尔兹所说：“从一个殖民统治国家过渡到一个独立国家，并不仅仅是从外国人到本地人的政权易手；这是整个政治生活模式的变迁，是从奴仆到主人的彻底变化。……新兴国家的政府虽然

^{*} 本文是作者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变化世界中的民族主义政治》的部分内容。

^{**}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东政治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推行寡头政治,但受到群众拥护并且关心群众;它们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打成一片,而且随着自身发展其统治方式更加有持续性、广泛性和目的性。”^①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来说,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都是一次革命性胜利,我们怎样称颂民族解放运动的功绩都不为过。

就本文主题而言,民族解放运动最直接的成果便是主权国家的建立。而国家政权的建立使得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第一次获得了国家形态的载体。这就为民族主义在新时期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平台。那么,独立后的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与争取民族解放阶段的民族主义相比,到底有哪些本质差别?它的基本目标、理论基础及主要功能会发生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正是本文想要着重考察的问题。

“从殖民统治下获得正式解放并不是高潮,而只是一个阶段。虽然这可能是个关键的必要阶段,但是,很可能远非一个最重要的阶段。”^②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主权国家的建立只是第一步。对于民族主义领导者和广大民众来说,主权国家建立之后的诸多发展问题才是民族主义运动面临的真正挑战。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立主要是外力催化的产物,而不是自身累积发展的结果。因此,新生的民族主义国家,缺乏支撑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存在和发展所需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理论准备。这种先天不足,使得新生政权所面临的问题远比西方政府复杂得多。正如美国学者罗格·欧文所说:“无论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获得权力的,中东新独立国家的统治者都面对着同它们的殖民者前任大致相同的问题。首先是促进防止帝国主义势力回潮的民族团结,赢得所有新国民的忠诚;此外,(民族主义领导者)还被诸如贫困、文盲、宗教和社会分裂、寻找资金发展经济等一大堆问题所困扰。”^③

这样,许多在发达国家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便成为亟须探讨的重要问题。著名阿拉伯问题学者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305~306页。

②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71页。

③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1.

Hourani) 便列出了阿拉伯国家在新独立后遇到的诸多困惑：“首先，什么是国家？换句话说，构成政治权威和忠诚对象来源的共同体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其次，共同体的利益与宗教观念、行为是什么关系或应该是什么关系？再次，民族（主要是通过国家来体现）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最后，政府应朝着哪几种可能的方向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目标？”^①

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政治）渗透性问题，即新兴国家如何通过国家建构过程来完成政权整合，使国家由传统的封建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过渡；第二，（经济）收益性问题，即如何尽早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第三，（文化）认同性问题，由于许多国家领土疆域的划定是殖民主义人为分割的结果，因而经常出现把同一个民族划分到不同的国家，或把不同的民族划分到同一个国家的混乱情况。在这种民族界限与国家领土界限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政权面临着如何把领土范围内不同民族、宗教、历史的人群整合为一个新的“国家民族”，并培养成对现行国家效忠的现代公民的问题。

与这种时代背景相呼应，新兴国家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正如前文所述，把民族主义称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十分勉强的，因为它的表现形态、理论主张和主要功能等与政治相关的种种特征，就像变色龙的皮肤一样，总能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己的颜色。因此，当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总体情况而言，独立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即国家民族主义）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治诉求、经济诉求、文化诉求三个方面。

（一）政治诉求方面，从争取民族独立转向国家建构

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独立前，民族解放和建立国家的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至少是不矛盾的两个目标。这种关联性体现在思想层面，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基本主张的混沌未分；体现在实践层面，是以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为共同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的国

^①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 – 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51.

家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以单个国家的形式出现的。有意思的是,这种与最初的奋斗目标有很大差距的现代国家一经产生,便马上开始生根发芽。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旦一个特定的疆域国家建立起来,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就尾随而至。一是试图估算、控制和限定居住在疆域范围内的居民;二是需要控制和维持新边界的治安,以防止入侵、走私和非法越境;三是与邻国缔结有关通行权和引渡各种非法活动罪犯的条约。”^①

正是由于巩固权力的需要,新兴民族主义国家才会很快建立起一套现代权力控制体系(如军队、警察、官僚制等)。这种权力体系的创建过程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领导者)自身处境的巨大转变,使得民族主义由一种破坏现行秩序的激进力量,逐渐转变为一种旨在维护现状的守成力量。这样,“一度作为一种进步力量的民族主义,如今在后殖民时代已经转型为一种维护少数人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些人曾经为争取独立而不懈战斗,但他们现在却试图去占据殖民主义者腾出来的特权职位”^②。

(二) 经济诉求方面,从缺失经济功能转向经济功能的增生和强化

就民族主义的基本构成来看,它实际是感性成分和理性成分的有机结合。从感性层面看,几乎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强调本民族历史传统和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从理性层面看,民族主义又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体现为它的政治整合功能和文化凝聚功能。而涉及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时,无论是学者,还是民族主义者自身,往往都是语焉不详或干脆顾左右而言他。这种情况至少表明,处理经济问题并非民族主义的长项。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民族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由于民族主义进行斗争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以及进行政治动员的文化领域。因而,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缺失倒也无妨大局。然而,一旦进入国家建设阶段,谋求实现经济现代化

^①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3.

^② 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 64.

便一跃成为新生政权的首要任务。正如罗格所说：“作为统治者，民族主义政党不遗余力地谴责殖民者的经济政策，说他们不支持工业发展、没有把钱花在教育上，或没有在创建类似国家银行这样的关键机构方面给予足够支持。现在，一旦自己取得政权，这种批评作为一种要求马上兑现的纲领，也摆在自己的面前。”^①

在社会经济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具有强大资源动员能力的民族主义政权自然成为推动本国经济现代化的初始动力，因此民族主义领导者成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和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民族主义自身发展变化的一道分水岭。至少从经济层面看，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功能缺失到经济功能的增生和强化，乃至成为全能主义政府的发展过程。

（三）文化诉求方面，从多元并存的认同转向对主权国家的认同

对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文化整合历来是个十分重要但又难以企及的政治目标。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斗争矛头的主要指向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封建主义），在外患大于内忧的背景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国内各种主张各异的政治力量，整合到反殖反帝的共同旗帜下。可以说，这些政治力量的联合仅仅是因为它们共同反对什么，而不是共同主张什么。这种政治主张的分歧决定了民族解放阶段的政治联合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在反对外来侵略时期存在的政治和谐，并不能保证一直延续到国家建设阶段。“实际上，真正能成功地唤起民众激情、引导他们反对外来统治的独立运动，都会企图掩盖这些运动所依赖的文化基础的脆弱和狭隘，因为它导致这样一种观念，即反殖民主义和集体身份的重新确定，是同一回事。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它们并非一回事。”^②然而，外敌既去，内讧即起。政治独立任务的完成，往往也同时意味着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矛盾斗争的开始。一般来说，

①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1.

②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72页。

在政治独立完成后,“曾经在反殖阶段占据主导的社会和谐被各种彼此不相容的社会现实所取代”^①。

就阿拉伯国家的情况来说,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作为传统力量象征的伊斯兰主义和作为现代性象征的民族主义曾相辅相成,共同肩负起反对西方殖民列强统治的重任。可一旦国家建立过程完成,在涉及如何建设国家,新国家应该向何处发展等关键性问题时,双方的矛盾分歧便日渐凸显出来。美国学者卡尔帕特就说过:“一个纯粹是宗教的文化同一个非宗教的亚文化群,只有在流行的思想体系并未看清它们各自的来源或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共存。”^②具体地说,伊斯兰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国家,而民族主义基本上代表着一种世俗化的发展道路。即使在民族主义力量内部,也存在着以阿拉伯民族为政治认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以现行国家为效忠对象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区别。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既相互交叉,又相互排斥,都想把新生的国家拉进自己的政治轨道。此外,许多阿拉伯国家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何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问题。凡此种种,使得促进思想统一、培育民众对新生国家的认同意识,成为新兴民族主义政权的重要任务。

二 导致中东民族主义转型的因素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国际政治现象也是如此。从历史的视角看,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政策主张的发展变化不可谓不大。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演变的发生呢?在此,笔者尝试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一) 总体形势的变化

首先是发展阶段的变化。从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政权的发展历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权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反对派到当权派,从破坏现行统治秩

① 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 53.

② [美] 凯马尔·H.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9~20页。

序到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发展过程。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具体手段，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或政变）、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等方式来颠覆现行的统治秩序。而到了国家建设阶段，民族主义的任务主要是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因而体现到操作层面，便是以“问题意识”代替“主义意识”，以“国家意识”代替“民族意识”，以维护现状代替对政治秩序的破坏。凡此种种，使得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正如格尔兹所说：“既然存在的是一个地方国家，而不仅仅是梦幻国家，那么，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它不再包括鼓动人民抵制受国外控制的政治制度，也不再组织为那个制度的垮台而举行的群众庆典。”^①可以说，新独立时期实际就成为民族主义者致力于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团结的时期。^②

其次是政权性质的变化。在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之前，许多阿拉伯国家处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是以扶植既存的封建王朝的形式进行统治的。如埃及的法鲁克王朝、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利比亚的费德里斯王朝等。这种生长在殖民主义阴影中的殖民政权，从内部看，其阶级基础主要是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从外部看，殖民政府往往与宗主国保持着亲密的政治经济关系。旧式政权的这些特性体现到指导思想，往往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封建民族主义。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少数政治精英与受传统观念熏陶的广大民众相叠加，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权领导人的内外政策脱离国情、统治基础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些政权被新型革命政权取代乃是大势所趋。如在埃及，亲英的法鲁克王朝被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政权取代；在伊拉克，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被阿拉伯复兴党政权取代；利比亚的费德里斯王朝被卡扎菲领导的军事政权取代；等等。

尽管新兴民族主义政权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尽相同（除了民族解放运动外，还包括军事政变），但总的来看，民族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小资产阶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73页。

② G. Abramov ed.,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Moscow: Social Sciences Today, 1976, pp. 45-46.

级、工人和农民阶级、手工业者阶层等中下层人民。可以说这些革命政权的统治基础是十分牢固的。而民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如国有化、公平分配产品、社会福利、反对西方等,集中体现着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政权的基本性质不完全相同,因此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行为实践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最后是时代大环境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欧洲殖民列强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战”后崛起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一种新型霸权。这两个超级大国并未直接威胁欧洲苦心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十分明显,它们也不打算帮助和保护这些殖民地。^①美国作为战后资本主义的最大代表,向来以“良性霸权”自居。它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十分典型。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军人物,更是处处以民族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自居。就亚非拉地区的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未有地动员和教育了亚非拉地区的广大民众,使人民日渐认识到争取民族自决权和民族解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已呈现星火燎原之势。而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带来的第二个变化,便是世界主题的根本性转变,即由战争与革命的阶段,逐渐转向和平与发展的阶段。当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严重敌对的冷战背景下,这种主题转换自然是一个渐进式的和不易察觉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战后重建工作的完成,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始步入快车道。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以经济和科技为重心的发展战略既让西方国家受益匪浅,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这种竞相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大潮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也逐渐认识并顺应这一新的历史潮流,把民族主义政权的奋斗目标由专注于政治

^① Christopher Clapham,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26.

独立转变到谋求经济发展上来。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存在形态和行为特征便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具体形势的变化

首先是政府政策的失败。国家民族主义取得政权载体后，它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影响主要是通过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体现出来。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自然会带有明显的强制色彩。然而，一项政策的具体效果如何，最终仍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民族主义政府无疑要对这种政策的后果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唯有在实践中被证明能够提高民众实际生活水平的政策，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也唯有正视民众实际利益的政府，才会得到民众持久的支持。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没有哪个政府最终能够摆脱“绩效困境”的束缚。在许多阿拉伯国家，新独立的革命民族主义政权在经济上推行社会主义，致力于土地改革、大规模国有化、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等；在政治上则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把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反对以色列作为基本的政治目标。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新兴民族主义政权所推行的种种内外政策，根本无法兑现当初它向民众所做的庄严承诺。这使得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从而使民族主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改变。

其次是领导人的代际更替。领导者个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往往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在任何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到达最高职位的人不在他所管理的政府中打上个人的印记。他们比别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来塑造他们所选择的政治和政策。”^① 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如此，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政治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结构性因素（如他们的人为性、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他们的国内社会结构等）来设定的。这就为个人色彩的政府留下了极大的余地”^②。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属于威权政体。领导人个人在政治决策

① Christopher Clapham,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72.

② Christopher Clapham,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75.

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如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约旦的侯赛因、埃及的纳赛尔等。而这些领导人由于受特定的历史经历、知识背景、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在制定内外政策时往往带有特定的价值偏好,这就使他们的治国方略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为维护政权统治,领导人特别强调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上的独特之处,如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萨德的复兴党社会主义、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等。而这种意识形态和具体政策一旦和领导人的功过评定和政治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时,它们便成为一种政治象征的符号,并因此开始日益僵化。换言之,这种意识形态是与领导人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形态的变更和内外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往往被理解为领导人的自我否定,理解为个人威信的丧失和权力基础的削弱。基于此,即使这些政策的效果不好,想要重新调整也殊为不易。

从历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调整主要是通过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办法完成的。一般来说,中东政治中较为普遍的“克里斯玛型”领导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个弱点,即个人魅力作为领导人的最大政治遗产,根本无法为后继者所继承。在这种情况下,后继者往往通过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定新的内外政策的办法,来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其中最典型的可能就是萨达特在接替纳赛尔之后所做的巨大的政策调整了。因此,领导人的更替,往往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三 惯性效应与民族主义转型的艰难

(一) 民族主义转型遭遇“惯性效应”

尽管国家独立的取得为民族主义实现政治抱负提供了广阔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转型过程会自动完成。相反,由于惯性效应的存在,这一过程漫长而艰难。惯性本来是个物理学概念,意指一个物体要不断保持运动或静止状态的趋势。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告诉我们,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条件下,始终保持运动或静止状态。这一表述对本文的启发意义在于它的逆向思考,即当一个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时,物体

的存在状态会怎样发生变化？这就涉及一个惯性效应的问题。何谓“惯性效应”，按照一种数理意味较浓的表述，它是指“当存在两个量 M 和 N，N 中的一个循环变化引发了 M 中的一个循环变化，由此在 M 中发生的变化总滞后于 N 中发生的变化，时滞就发生了。在任何一个时点上 M 的值不仅仅依赖于 N 的实际值，而且也依赖于所有前面 N 中发生了的变化”^①。它的英文表述“hysteresis”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在经济学理论中，经常用“滞后”来说明那些仍然留存下来的东西，即在一个冲击已经消失，这个冲击的影响仍然会保留在体系里。^②

这一理论方法 and 研究视角对国际政治研究是非常适用的。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国际政治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问题研究两个大的领域。至少在问题研究领域，每一种国际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研究对象当下状态的考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历史因素的影响。更明确地说，当一种能够对研究对象产生巨大影响的客观历史力量消失后，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这种外在历史力量的影响在这种历史力量消失后仍能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样，就使研究对象在许多方面仍表现出既往的行为特征。笔者把这种效应称为国际政治中的惯性效应。

就本文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而言，在其发展历程中同样面临着惯性效应问题。争取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一直是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确立政治正当性和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关键性内容。同时，这也是民族主义不懈奋斗的最终目标。而当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的任务完成之后（一般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民族主义便面临着重建理论基础、寻找新的奋斗目标等脱胎换骨性质的重大调整。然而，这种全方位的调整不可能随着政治独立的胜利一并完成。在很多情况下，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往往习惯于沿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的思维定式和基本方法来处理和平建设时期面临的诸多问题。“事实证明，建立国家的任务是如此劳神，以至于能够让这种幻觉乃至整个革命的道德氛围，在统治权移交之后，仍保留一

① 参见〔挪威〕斯坦因·U. 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8页。

② 参见〔挪威〕斯坦因·U. 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9页。

段时间。”^①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民族主义政党的职能就是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当完成这一使命并需使自己适应行使统治国家的新职能时，它往往会遇到一场重大危机。它也许会发现这种不同职能的过渡太困难，以至在独立以后，还不得不继续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和殖民主义作斗争。”^② 这就是民族主义政治经常面临的惯性效应问题。这种惯性作用往往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后再重新进行调整。

至于此后的民族主义到底向何处发展，这主要取决于独立后的民族主义和何种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以及它和这种政治力量结合的时机把握。从阿拉伯世界来看，虽然各国政策重新调整的具体时间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政权开始改弦易辙，逐渐回归到一种较为现实、理性的行为状态。从整体趋势看，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的政策调整大致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在这一政策调整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的便是由惯性效应造成的过渡性历史时期。

（二）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

既然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那么民族主义发展必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样，对其进行历史阶段划分便显得十分必要。美国文化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把民族主义的历史分成四个主要阶段：“民族主义形成和具体化时期；民族主义者取得斗争胜利时期；民族主义者建立自己国家的时期；最后一个即现阶段，民族主义者在组建国家之后，发现他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和他们的国家从中产生的非常规社会，确立和稳定关系。”^③ 而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前主任罗格·欧文把中东国家的创立过程分为互相联系的三个阶段：殖民时期国家、新独立国家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73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16页。

③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71页。

和威权国家三个阶段。^① 苏联学者卡姆 (G. Kim) 也认为, 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赢得政治独立后, 进入了一个致力于经济独立的新阶段。^② 三位学者, 有的从事人类文化学研究, 有的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研究, 有的专门研究中东政治, 尽管他们研究的对象和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历时性的视角进行观察, 并注意到了研究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就此而论, 几位学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从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创立过程看, 其发展阶段基本可以分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两个大的历史时期。然而, 考虑到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惯性效应, 笔者认为, 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迥然不同的三个时期: 民族解放时期; 新独立时期; 国家建设时期。这三个时期民族主义的基本处境、奋斗目标、具体手段和指导思想都存在很大差别。

在民族解放时期, 民族主义是以民间力量形式存在的。它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民族解放, 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具体手段上采用大规模政治动员的方式, 以武装 (或和平) 斗争的方式来反抗西方殖民统治压迫, 这说明这些阶段民族主义在政治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手段方面总体上是契合的。在指导思想上, 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当时政治思潮的主流, 而以建立地方国家为目标的国家民族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

在新独立时期, 民族主义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存在。因此, 它的奋斗目标已经开始由争取民族解放转到国家建设上来。在这一时期, 新生政权面临着系列新的问题。正如罗格·欧文所说: “不管怎么说, 无论他们获得权力的条件是什么, 中东新独立国家的统治者面临着与前任殖民者同样的问题。首先是通过实现民族团结来反对正在撤退的殖民列强; 其次是获得全体国民的忠诚。此外, 他们也面临着由贫困、文盲、宗教、社会分裂和寻求发展资金的需要引起的问题。”^③ 但是在建设国家的具体手段上, 它所

①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6.

② G. Abramov ed.,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Moscow: Social Sciences Today, 1976, p. 5.

③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1.

沿用的仍是一种民族解放时期使用过的方法,即通过排除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和群众动员的方式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实践表明,这种具体手段与奋斗目标背道而驰的。激进的发展模式非但不能给国家带来繁荣发展,反而会使国家陷入新的困境。在对外政策方面,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混合物,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在实践中导致的必然结果便是地区政治秩序的动荡多变。总的来看,从民族解放到国家建设的过渡阶段,在理论基础和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因而这一时期必然是个暂时性的发展阶段。

到国家建设时期,随着民族主义政权的逐步巩固,民族主义逐渐把推动现代化进程作为首要职责。在具体手段上,在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和国家民族主义日渐成熟的情况下,民族主义通过参与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的办法来推动国家建设。这就使民族主义在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手段之间重新确立起一种良性互动。在指导思想上,以现行国家为认同对象的国家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内容,国内社会趋于稳定,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也日趋正常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述重点主要是新独立时期和国家建设时期。

四 转型期民族主义面临的困境

相对于民族解放斗争来说,全面建设新国家的任务要复杂得多。这既表现为国家建设所涉议题的繁复,又表现为国家建设过程的漫长和所用手段的烦琐。而在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鼓舞下,民族主义领导者总是倾向于采用某种“革命性”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新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施政方针具有明显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和“革命主义”特征。实践表明,这种简单化的、带有强烈颠覆色彩的政策措施,非但没有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反倒使民族主义陷入意想不到的发展困境。

第一,领袖魅力与政治制度化的矛盾。政治制度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则往往是政权革新在前,而政治制度化在后。从长远来说,建立在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当然更稳定,但政治制度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国情使然,加之国家上下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效实现国富民强,赶超西方国家的迫切心态使民族主义领

导者有意无意地略过了政党、民主参与等一些“程序性”的东西，而直接去发号施令。民族主义更多的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而不是靠系统规范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他们（如纳赛尔等）更多的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同意去管理一切事务。这种政治决策模式或许有效一时，但一代风云人物的领袖风范和个人魅力作为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是无法被后来者所继承的。

这种政治继承危机从一个侧面说明，民族主义（政权）政治建设功能的缺失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制度化滞后，使民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取向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导致威权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这使得民众对民族主义所寄予的热切期待逐渐幻灭，取而代之的则是前所未有的茫然和深刻的认同危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曾经寄托在几个非凡领袖身上的获得政治解救的近似千禧年运动的希望，现在不仅扩散到大量的显然不那么非凡的人物身上，而且这些希望本身也逐渐淡化。魅力领袖显然可以做到的对社会能量的巨大凝聚作用，随着这些魅力领袖的消失而消失了。”^①

第二，政治取向的经济现代化。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大卫·麦克利兰曾提出一种“成功需求”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个人为谋求利益走在前面，或为了让社会以某种形式承认和赞赏，因而具有迫切要求改善自己地位的强烈愿望。这种成功需求既非先天遗传，也非生理需要，而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它含有“与别人较量”的社会意义。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怀有一种渴求赶超西方的“成功需求”。

中东民族主义者相信，西方列强和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源自西方工业化发展的成功。因此，要想有效回应西方挑战，必须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在和平时期，这种抵御外辱的民族危机意识便转化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生产热情和期待成功的强烈愿望。在这里，抵御西方入侵与增进人民福利这两个部分重叠的愿望，被有机地结合进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这就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可能为换取国家整体经济利益而忍受对个人利益的损害。

因此，中东国家启动现代化包含了多重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希望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68页。

通过工业化使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本身。正如罗德内·威尔逊所说:“(对中东领导人来说)提高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即使被提及,也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实力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威望。已设定了这样的基本目标,对中东地区那种把民族主义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就不觉得奇怪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味追求工业化而不顾实际财政的现象。因为利润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甚至是有意义的动机。”^①中东民族国家领导人所推行的政治性的现代化,使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存在一种“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不良倾向。其结果往往是不顾国情和客观需要盲目发展,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资源配置不合理。这种“政治性”的现代化由于过分考虑政治,使中东国家经常出现经济政策偏离经济建设目标的情况,^②少数国家甚至把发动战争视为增强国家实力的捷径(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在处理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经济关系时,民族主义者一般倾向于把原有经济体系(尤其是依附于西方的经济体系)视为殖民统治的象征而加以改变。很显然,“这种当地民族主义与对外部的依附的冲突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显而易见。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坚持殖民地人民统一强度问题上,越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独立后越是要推翻殖民统治留存下来的所有东西,他们与前宗主国的关系也越紧张”^③。他们以减少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换取经济独立。其结果使中东国家离世界经济大潮越来越远,自身处境越发艰难。

第三,内政与外交的内在紧张。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政治独立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民族解放任务的彻底完成。他们认为,阿拉伯世界“一族多国”的状况乃是殖民统治人为分割的结果,因此,要想彻底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繁荣强大,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样,“实现阿拉伯统一”这一变革性目标,自然成为民族主义政权对外交往的行动逻辑。这要比致力于培养对现行国家认同和忠诚的文化整合任务更具政治合法性,更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然而,阿拉伯国家全力以赴的阿拉伯统一事业,因直

① Rodney Wils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39.

② [美] D. H. 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第39~40页。

③ Christopher Clapham,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118.

接触及自己赖以立身的国家主权原则而使阿拉伯世界陷入了十分罕见的“要民族还是要国家”的“规则困境”。这样，在世界其他地方作为给定前提的主权国家原则，落实到中东地区却成了一个竞争性的概念。这种政治交往理念的冲突及由此导致的行为表现差异，很容易导致层出不穷的国家间冲突。尤其对于那些野心勃勃、企图争夺地区霸权的领导者来说，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去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无疑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一些阿拉伯人认为现存的政治分裂是非法的、有问题的和应该否定的……他们相信，既然（现行国家）都是更大的阿拉伯国家的组成部分，那么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便是合乎时宜的。”^①至少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例表明，许多阿拉伯人根本没把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当回事儿，因为他们不相信阿拉伯世界会永久分裂下去。^②

因此，中东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性外交政策，非但未使中东国家变得更加强大繁荣，反而使该地区陷入长期动荡冲突。高昂的战争费用，使许多国家本就进展缓慢的经济建设雪上加霜。由于中东地区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东各国不得不始终把军事安全放在首要位置，造成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居高不下。“这实际上是把本该投向教育、生产的资金花费在军事动员和装备方面，造成社会经济、政治和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而这不是能轻易恢复的。”^③

小 结

在政治独立完成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主义者感受到的不仅有胜利的喜悦，更多的是困惑和茫然。随着曾经使广大民众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外部威胁的消失，随着“宏大叙事”让位于“平常叙事”和国家治理过程中种种问题的渐次暴露，民族主义的号召力日渐衰微。这时，民族作

① Deborah J. Gerner & Philip A. Schrodt, *Middle East Politics*, Edited by Deborah J. Gerne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p. 97.

② Asad Abukhalil, “A New Arab Ideology: The Rejuvenation of Arab Nationalism,”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6, No. 1, winter 1992, p. 27.

③ Jamil E. Jreisat, *Politics without Process: Administering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 205.

为整体的普遍向前的运动，已经被一个复杂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不同部分的运动所取代。党派纷争、阶级分化、官僚体制的低效和腐败、利益集团的不断衍生，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政治思想的混乱。这导致了一种不是进步而是令人焦虑的停滞的感觉。^① 人们开始领悟到：“那些曾经被看作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反映，并且会随着它的消失而消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其根源并不肤浅。”^② 就像一位西方学者所说：“非殖民化时期和它随后的时光，只是先前的殖民国家政治进化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和一套新的政治认同开始迅速萌芽、开花，然后同样迅速地凋落：满腔希望忽倏即灭。”^③ 而民族主义能否摆脱这场革命之后的新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摆脱思维定式，尽快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从这种意义上说，命运仍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责任编辑：申玉辉]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 269 页。

②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 269 页。

③ Christopher Clapham,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71.